

2001—2020 年国际舆论研究的进展和趋向—— 基于《舆论季刊》和《国际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

廖圣清, 付 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舆论季刊》和《国际舆论研究》是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舆论研究期刊,其刊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舆论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2001—2020 年间,这两本刊物刊发了 807 篇研究论文。对这些论文的内容分析结果显示:北美洲地区以及高校机构的研究者较为活跃,形成了以政府和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为主力的研究队伍;政治与选举、舆论调查方法为主要研究议题,性别、移民等社会问题研究为补充;更多开展实质性研究,注重态度层面的舆论效果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依赖传统调查法;跨学科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但新学科组合鲜见;拥有较高的理论构建水平,缺乏理论创新。未来需要提升研究方法和研究样本的多样性,加强理论批评、改进,吸纳不同学科协同参与,共同推进舆论研究向前发展。

关键词: 舆论研究; 内容分析; 理论建构 《舆论季刊》; 《国际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23)06-0090-13

Progres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From 2001 to 2020: Based on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LIAO Shengqing, FU Rao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content analysis, text mining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is study examined 807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i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from 2001 to 2020, and comprehensively explored the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researchers, research content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searchers in North America and universities are more active, forming a research team focusing on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science, sociology and communication; politics, elections and public opinion survey methods

收稿日期: 2023-04-12

基金项目: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广播新闻舆论引导力研究”(编号: GD1904)、云南省社科规划社会智库项目“云南省涉藏外宣网络阵地建设对策研究”(编号: SHZK2023422)、云南省媒体融合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项目“基于混合方法的南亚东南亚对华态度与情感研究”(编号: 120235201)、复旦大学人文社科先锋计划“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谱系: 议题、方法与理论(1998-2017)” (编号: KJAQ202112001)

作者简介: 廖圣清(1971—),男,江西赣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计算传播。

付 饶(1990—),男,广西桂林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计算传播。

are the main research topics, supplemented by such social issues as gender, immigration, etc.; the researchers carry out more substantive research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ect of public opinion at the attitude level; the researchers mainly use empirical research and rely on traditional survey methods; the level of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has been improved, but the combination of new disciplines is rare; the researchers have a high level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but lack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enhance the diversity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samples, strengthen theoretical criticism, improve and attract the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Key words: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ontent analysi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舆论是“个体意见的集合”^[1],是社会生活的关键部分。舆论研究有着漫长的历史。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扩散,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不同于以往,社交媒体成为大众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的主要渠道。数字化媒介的发展强化了选择性接触、信息过载等问题对舆论的影响^[2]。在高度个性化的信息传播环境中,媒体使用的多元化、推荐算法的广泛应用等舆论环境的变化,使得舆论研究日趋复杂、重要凸显、挑战严峻^[3]。因此,本研究对2001—2020年间国际上的舆论研究进行考察,以期了解近20年国际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发展趋势,为推动舆论研究提供理论思考与实证材料。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本体论、认识论和目的论是社会科学的核心,分别对应着“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为什么研究”等关键问题^[4]。科学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研究者群体的基本特征^[5]。考察“谁在研究”是分析研究状况的重要内容。已有国际舆论研究成果的回顾式研究,大多考察“研究什么”或“如何研究”中的一个方面。对“研究什么”的回顾,主要关注大众传播与政治舆论、政治政策与舆论等特定议题^[6]。对“如何研究”的回顾,主要围绕调查响应率下降、社交网络和在线媒体数据收集带来的偏误等舆论调查方法议题展开^[7]。少数研究从“为什么研究”方面回顾舆论研究^[8],发表时间较早。有研究从“谁在研究”“研究什么”“为什么研究”方面回顾舆论研究^[9],但数据缺乏代表性,且未对舆论研究进行系统评价。

对学术期刊进行研究,能够探索学科的研究焦点、了解研究的发展趋势^[10]。本研究以《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国际舆论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发表的论文为研究对象。《舆论季刊》和《国际舆论研究》是两本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舆论研究国际期刊,分别隶属于美国舆论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和国际舆论研究协会(World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自1937年创刊以来,《舆论季刊》是被引用最多的同类期刊之一;《国际舆论研究》则同样是获取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可靠来源。两本期刊的论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舆论研究的发展。本文首次从“谁在研究”“研究了什么”“如何研究”“为什么研究”四个方面,较为全面地探讨近20年国际舆论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 谁在研究舆论

研究者所属地区,可以表征研究领域观点的多样性;研究者所属机构,可以反映学科的流动性;研究者学科背景,能够反映学科内部或学科之间的思想流动。先前的研究显示,绝大多数舆论研究者来自北美洲,大学研究者较为活跃,心理学、政治学学者越来越多地主导舆论研究^[11]。

研究问题1:2001—2020年,国际舆论的研究者所属地区、机构、学科背景的情况及其变化如何?

(二) 研究了舆论什么

研究什么,包含研究议题、研究内容。研究议题反映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内容反映舆论研究的领域重心。进入21世纪,舆论研究多与党派意识形态、政治腐败、总统选举、媒体信任水平、战争与恐

怖主义等主题相关^[9]。

研究问题 2: 2001—2020 年, 国际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及其变化情况如何?

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实质性(substantive) 研究和方法论(methodological) 研究; 前者是应用或实践层面的研究, 后者是对研究方法的研究; 1972—1986 年间, 实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渠道研究和效果研究, 方法论研究主要针对抽样方法、调查设计、调查响应率等问题^[12]。舆论是一种以公民为主体的传播^[13]。21 世纪以来, 舆论研究从报纸、电视转向网络、社交媒体, 舆论的受众研究涉及政府、媒体、政治个体等受舆论影响的对象。研究者不断推动舆论调查方法的更新, 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丰富了调查工具, 为方法论研究提供了新动力。

研究问题 3: 2001—2020 年, 国际舆论研究的实质性研究、方法论研究的情况及其变化如何?

(三) 如何研究舆论

如何研究指支撑研究开展的所有方式, 包括研究取向、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等方面。研究取向相互可以形成补充, 共同促进学科发展, 可分为实证主义、诠释主义、批判主义和其他四种。初期, 概念的不一致性成为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 许多研究者对此进行诠释研究; 20 世纪末期, 大多数舆论研究是基于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14]45—67}, 以探究新的舆论环境或者调查方法。

研究问题 4: 2001—2020 年, 国际舆论研究的取向及其变化如何?

研究方法是开展研究的重要保障, 主要分为定性方法、定量方法与混合方法。调查法是舆论研究最常使用的方法^[15]。20 世纪 70 年代后, 《舆论季刊》使用量化研究方法论文的占比突破 40%。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研究者不再处于只能使用单一调查数据分析报告舆论的时代。

研究问题 5: 2001—2020 年, 国际舆论研究的研究方法使用的情况及其变化如何?

分析研究的数据来源, 可以发现研究主要考察的地区, 检视研究的普遍性。曾经, 绝大多数舆论研究的数据来自美国。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舆论研究向跨国研究转变, 寻求更加广泛的数据和证据, 包括使用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区的数据^[16]。

研究问题 6: 2001—2020 年, 国际舆论研究的数据来源的情况及其变化如何?

分析研究受到资助的情况, 被广泛运用于检视学科的发展水平, 是否获得资助会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外在效度。1954—1978 年间《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和《舆论季刊》仅有 26% 的论文获得资助, 资助主要来自私人机构、政府机构^[17]。而美国舆论协会的研究大多以数据共享而非直接资助的形式进行。

研究问题 7: 2001—2020 年, 国际舆论研究受到资助的情况及其变化如何?

分析研究的跨学科合作, 可以了解研究从哪些相关学科汲取养分, 跨学科的思想交流, 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在学科形成之初, 舆论研究就被认为是不同领域高度合作的结果。

研究问题 8: 2001—2020 年, 国际舆论研究跨学科合作研究的情况及其变化如何?

(四) 为什么研究舆论

为什么研究, 主要从理论构建和被引用情况进行考察。理论是开展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理论构建包含了理论建设所需的多个维度, 其中, 理论引用和应用只是理论构建的初级阶段, 即浅层使用; 新理论的提出、验证和改进等才是理论建设的核心部分^[10]。早期, 基于心理学测量方法的发展, 舆论研究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心理学。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 大众媒体被认为对政治舆论具有强大影响力, 舆论研究主要使用传播学理论。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 信息处理理论和认知理论被广泛使用, 以研究调查响应问题^[18]。

研究问题 9: 2001—2020 年, 国际舆论研究理论构建的情况及其变化如何?

高被引用论文可以代表不同时期研究的热点、影响力与学术贡献。对 1937—2010 年间《舆论季刊》刊发的论文分析发现, 被引用频次最高的论文是 McCombs & Shaw 在 1972 年发表的论文《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舆论研究中高被引用论文大多与政治学相关, 围绕舆论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展开^[12]。

研究问题 10: 2001—2020 年, 国际舆论研究的高被引用论文的情况如何?

二、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于2021年6月从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获取2001—2020年间《舆论季刊》《国际舆论研究》刊发的所有论文相关信息,字段包括来源篇名、来源作者、期刊、第一作者、作者机构、年代卷期、被引次数、论文摘要等,经人工复核,剔除会议综述、书评等,获得807篇研究论文,其中,《舆论季刊》445篇、《国际舆论研究》362篇。本研究主要使用内容分析方法,由两位经过培训的编码员进行编码,编码员一致性信度(Cohen's Kappa)为0.92,采用SPSS进行统计分析。

(二) 变量测量

1. 谁在研究舆论

测量主要包括所有作者的所在地区,编码为:1—北美洲 2—南美洲 3—亚洲 4—欧洲 5—大洋洲, 6—非洲;所属机构,编码为:1—高校 2—企业 3—政府 4—科研机构 5—其他;学科来源情况,通过检索作者个人信息确定^①。

2. 研究了舆论什么

测量主要包括研究议题、研究内容。研究议题使用基于Transformer模型的深度学习模型,通过聚类分层主题建模对包含摘要的764篇论文的摘要进行主题建模,使用类TF-IDF方法提取每个主题的关键词^[19]。研究内容分为实质性研究和方法论研究。实质性研究分为:1—舆论主体研究 2—舆论内容研究 3—舆论传播渠道研究 4—舆论受众研究 5—舆论效果研究。其中,舆论主体研究分为:1—个人特征 2—心理特征 3—经历、经验 4—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信仰 5—社会环境背景;舆论内容研究分为:1—新闻和评论 2—娱乐 3—广告 4—影像 5—图表 6—综合考察媒介的所有内容 7—其他;舆论传播渠道研究分为:1—印刷媒体 2—广播 3—电视 4—互联网 5—移动设备 6—其他媒介 7—多种媒介;舆论受众研究分为:1—政府 2—媒体 3—组织、党派团体 4—个人、政治人物;舆论效果研究分为:1—认知 2—态度 3—行为 4—其他。方法论研究分为:1—样本及抽样设计研究 2—调查工具研究 3—问卷设计研究 4—调查响应率研究 5—其他^[12]。

3. 如何研究舆论

测量主要包括研究取向、研究方法、数据来源、资助情况、跨学科合作研究。研究取向分为:1—实证研究 2—批判研究 3—诠释研究 4—其他。研究方法分为:1—实验法 2—调查法 3—内容分析法 4—深度访谈 5—话语分析 6—民族志 7—网络分析 8—其他方法 9—无方法。数据来源分为:1—亚洲 2—欧洲 3—非洲 4—北美洲 5—南美洲 6—大洋洲 7—跨洲数据 8—无数据。资助情况分为:1—政府机构 2—高校 3—私人机构 4—其他 5—无资助。跨学科合作研究的测量,包括是否存在跨学科合作研究及跨学科合作研究网络的特征。如果一篇合作论文的作者属于不同学科或研究领域,编码为:1—存在跨学科合作研究;独作或作者属于同一学科,编码为:2—不存在跨学科合作研究。跨学科合作研究网络的测量:首先确定807篇论文1464位作者所属的22个学科背景,随后构建一个 807×22 的二模矩阵,每行为一篇文章,每列为一个学科,每个单元格内是一篇文章同一学科的作者数量,最后将其转换为 22×22 的一模绝对共现矩阵进行社会网络分析^{[20]104-157}。网络结构特征的分析指标,包括边数,即学科之间的联系数量;平均度数,对联系的平均度量;网络密度,表明相互关联程度;连通性和碎片化,表明节点的可达性;平均距离,表明节点的接近度^[21];对绝对共现矩阵进行核心—外围分析,确定在跨学科合作研究网络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学科。本文采用Ucinet进行社会网络分析,Gephi进行网络可视化。

4. 为什么研究舆论

理论构建的测量,包括理论含量、理论偏好、理论来源和理论使用。理论含量,指论文是否含合理

① 来源包括:Research Gate、大学教职信息和其他个人资料页面如LinkedIn、Google Scholar、和ORCID等。

论。理论偏好,指包含理论的论文提及的具体理论和频次。理论来源,指理论源自哪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包括:1-传播研究 2-心理学 3-社会学 4-政治学 5-信息科学 6-经济学 7-哲学 8-艺术与文学 9-语言学 10-生物学,不属于以上学科、领域或无法识别学科、领域的编码为 11-其他^[22]。理论使用,指理论在论文中的角色和作用,包括:1-仅引用 2-作为研究框架 3-理论比较 4-理论评价 5-提出新理论 6-理论检验 7-理论整合 8-理论改进和 9-理论应用,不属于上述使用情况和无法识别的编码为 10-其他,并将 1-仅引用和 9-理论应用重新编码为理论的浅层使用 2至8重新编码为理论深层使用^[23]。

被引用情况的测量,采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21 年 6 月显示的论文被引用数量。

本研究还将数据分为 2001—2005 年、2006—2010 年、2011—2015 年和 2016—2020 年四个时段,以展示各个变量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三、研究结果

(一) 谁在研究舆论

2001—2020 年间,共有来自北美洲(占比 68.9%)、欧洲(占比 22.5%)、亚洲(占比 7.0%)、南美洲(占比 1.1%)、非洲(占比 0.3%)、大洋洲(占比 0.2%) 的 1464 位作者。可见,舆论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北美洲,但占比呈下降趋势,从 2001—2005 年的 78.3% 减至 2016—2020 年的 58.4%;欧洲研究者占比大幅增长,从 2001—2005 年的 9.4% 升至 2016—2020 年的 32%;亚洲研究者占比没有明显变化,各时期占比均不足 10%;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研究者占比较低。舆论研究者洲际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 = 124.546$ $p < 0.001$)。

舆论研究者绝大多数来自高等院校(占比 82.0%),且占比波动上升,从 2001—2005 年的 83.8% 增至 2016—2020 年的 88.9%。研究者所属机构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 = 60.306$ $p < 0.001$)。

舆论研究者来自 22 个学科,政府和政治学(占比 30.0%)、社会学(占比 27.3%)、传播学(占比 22.0%) 是舆论研究主要的三个学科来源,其余学科占比均未超过 10%。政府和政治学占比波动上升,传播学占比涨幅较小,社会学、心理学占比下降。研究者学科来源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 = 245.141$ $p < 0.001$)。

(二) 研究了舆论什么

本研究从有摘要数据的 764 篇论文摘要中提取出 5612 个单词,总频次为 64045,平均每个单词被使用 11.41 次。被使用最多的是“调查”一词,1183 次,占总词频的 1.85%。2035 个单词(占比 36.26%) 仅被使用 1 次,占总词频的 3.18%。使用超过 200 次的单词 27 个,累计频次占总频次的 14.94%。“数据”“应答”“样本”“偏误”等单词与调查方法相关,“选举”“民调”“党派”“选民”等单词与政治与选举相关,这两类单词占比多、频次高。“新闻”“信息”等与新闻传播相关的单词同样出现在高频词中。

表 1 展示了国际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及其关键词。舆论研究主要围绕 8 个议题展开,首要关注“选举与政治”(占比 43.2%)、“舆论调查方法”(占比 30.5%);其次是“性别及同性”(占比 7.3%)、“移民问题”(占比 4.6%)、“战争问题”(占比 4.6%),“种族问题”“经济问题”“科技问题”,占比较低。“选举与政治”议题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 2001—2005 年的 46.9% 上涨至 2016—2020 年的 52.8%;舆论调查方法的占比下降,2006—2011 年的占比(44.6%) 达到顶峰。舆论研究议题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 = 79.667$ $p < 0.001$)。

表 1 国际舆论研究议题的总体情况及时期比较(% $\mu=807$)

项目		总体	时期比较(单位: 年)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2016—2020
研究议题	议题关键词					
政治与选举	党派极化 投票行为 选举民调 民族主义 党派认同 政治知识 党派意识形态 政策偏好	43.2	46.9	31.1	40.2	52.8
舆论调查方法	调查响应率 随机拨号调查 调查问题设置 调查激励措施 互联网调查 调查访问员	30.5	22.3	44.6	37.0	18.9
性别问题	性别差异 同性权力 同性婚姻 性别歧视	7.3	9.2	7.8	5.0	7.9
移民问题	移民态度 反移民 欧洲移民 移民威胁	4.6	0.0	3.6	5.0	7.2
战争	战争支持 恐怖主义 伊拉克战争 9·11 军队伤亡 本·拉登	4.6	6.2	4.7	5.0	3.4
种族	非洲裔 奥巴马 种族政策 穆斯林 少数族裔 拉丁裔	3.6	3.8	3.6	4.1	3.0
经济	金融危机 经济政策 收入水平 福利待遇 欧洲一体化	2.7	4.6	1.0	1.4	4.2
科技问题	生物技术 基因工程 转基因食物 转基因农业 核能技术	2.6	3.1	3.6	1.8	2.3
	其他	0.9	3.8	0.0	0.5	0.4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χ^2				79.667	
	Sig. 值				0.000	

2001—2020 年间 ,两刊刊发的实质性研究论文占比 62.9% ,方法论研究论文占比 37.1% 。方法论论文的占比从 2001—2005 年的 28.5% 大幅提升至 2006—2010 年的 50.8% ,但至 2016—2020 年下降至 27.2% 。舆论研究内容时期变化的差异 ,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33.105$ $p<0.001$) 。

实质性研究主要关注“舆论效果研究”(占比 35.4%) 和“舆论主体研究”(占比 34.6%) ; “舆论内容研究”占比 11.2% , “舆论渠道研究”占比 10.4% , “舆论受众研究”占比 8.3% 。舆论效果研究不断上涨 ,从 2001—2005 的 25.8% 上涨至 2016—2020 年的 43.0% 。“舆论主体研究” “舆论受众研究”和“舆论渠道研究”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舆论实质性研究主题时期变化的差异 ,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25.136$ $p=0.014$) 。

在舆论效果研究中, “态度研究”占比(59.4%) 超过一半, “行为研究”和“认知研究”的占比分别为 22.8% 和 17.8% 。然而 ,舆论效果研究时期变化的差异 ,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8.244$, $p=0.209$) 。

在舆论主体研究中, “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信仰”、“个人特征”和“经历经验”的占比相近 ,分别为 26.3% 、24.0% 、24.0% ,位列前三 “心理特征”占比 18.3% ; “社会环境背景”占比仅 7.4% 。然而 ,舆论主体研究时期变化的差异 ,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5.686$ $p=0.940$) 。

舆论内容研究主要关注“新闻与评论” “娱乐内容” ,占比分别为 66.7% 、10.5% ,其余研究占比均不足 10% 。然而 ,舆论内容研究时期变化的差异 ,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18.371$ $p=0.182$) 。

在舆论渠道研究中, “多种媒介”、“印刷媒介”和“电视”的占比分别为 43.4% 、20.8% 、17.0% ,位居前三; 其余研究占比均不足 10% 。然而 ,舆论渠道研究时期变化的差异 ,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21.243$ $p=0.109$) 。

舆论受众研究主要关注“政府” “组织、党派团体” “个人、政治人物” ,占比分别为 42.9% 、31.0% 、26.2% 。“政府”的占比大幅下降 ,从 2001—2005 年的 90.9% 下降至 2016—2020 年的 36.4% ; “组织、党派团体”呈现上升趋势 ,从 2001—2005 年的 9.1% 快速增长至 2016—2020 年的 18.2% ; “个人、政治人物”的研究从无到有 ,并从 2006 年开始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 ,舆论受众研究时期变化的差异 ,

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 = 18.774$ $p = 0.02$)。

在方法论论文中,“调查响应率研究”占比 32.6%,“调查工具研究”占比 24.6%,“问卷设计研究”占比 24.6%,“样本及抽样设计研究”占比 16.6%,“其他研究”占比 1.6%。然而,舆论研究方法论文主题时期变化的差异,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 = 9.408$ $p = 0.668$)。

(三) 如何研究舆论

国际舆论研究绝大多数是实证研究,占比 96.4%;诠释研究占比仅 2.1%;批判研究与其他取向研究的占比均不足 1%。2001—2020 年间,实证研究占比呈现波动增长趋势,从 2001—2005 年的 88.5% 增长至 2016—2020 年的 99.6%;诠释研究的占比,从 2001—2005 年的 6.2% 减少至 2016—2020 年的 0.4%;批判研究的占比逐年下降,2016—2020 年未出现此类研究。而且,舆论研究取向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 = 29.315$ $p < 0.001$)。

国际舆论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调查法、实验法,占比分别为 60.5%、22.7%,其余方法的占比均未超过 10%。2001—2020 年间,调查法、实验法的占比上升,从 2001—2005 年的 50.0%、16.9% 上涨至 2016—2020 年的 59.6%、28.3%;2016—2020 年开始出现社会网络分析法,占比不足 1%;无研究方法的占比从 2001—2005 年的 10.8% 下降至 2016—2020 年的 0.8%。而且,舆论研究方法使用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 = 62.669$ $p < 0.001$)。

国际舆论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6 个大洲及跨洲数据,北美洲和欧洲是主要数据来源地,占比分别为 57%、21.7%;其余地区的占比均不到 10%;无数据来源的占比为 3.8%。2001—2020 年间,国际舆论研究主要的数据来源地为北美洲,但占比呈下降趋势,从 2001—2005 年的 60.0% 减少至 2016—2020 年的 50.9%;欧洲、亚洲数据的占比上升明显,从 2001—2005 年的 15.4%、6.2% 增长至 2016—2020 年的 29.1%、9.4%;其余大洲和跨洲多国数据小幅上升;无数据论文的占比大幅下降,从 2001—2005 年的 10.8% 下降至 2016—2020 年的 1.1%。而且,舆论研究数据来源于地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 = 44.305$ $p = 0.001$)。

四类机构资助了 33.8% 论文的研究,其中政府机构占比 23.5%,高等院校占比 7.4%,私人机构占比 1.1%,其他机构占比 1.7%。2001—2020 年间,未获得资助的论文占比呈明显下降趋势,从 2001—2005 年的 80.8% 减少至 2016—2020 年的 56.2%。各机构资助占比均呈现上升趋势。舆论研究受资助情况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 = 51.418$ $p < 0.001$)。

国际舆论研究存在跨学科合作研究的论文占比 25.8%。2001—2020 年间,跨学科合作研究论文占比波动上升,从 2001—2005 年的 16.2% 上涨至 2016—2020 年的 31.3%,涨幅达 92.6%。而且,舆论研究跨学科合作研究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 = 11.545$ $p = 0.009$)。

表 2 国际舆论研究合作研究网络的总体情况及时期比较(%, $n = 807$)

项目	总体	时期比较(单位: 年)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2016—2020
国际舆论研究合作研究网络					
边数	158	68	70	106	62
平均度	7.182	3.091	3.182	4.818	2.818
密度	0.342	0.147	0.152	0.229	0.134
联通度	0.909	0.455	0.394	0.455	0.338
碎片度	0.091	0.545	0.606	0.545	0.662
平均距离	1.686	1.762	1.758	1.533	1.667
核心学科*	社会学	社会学	社会学	社会学	政府及政治学
	(0.593)	(0.534)	(0.654)	(0.613)	(0.625)
	政府及政治学	经济学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	社会学
	(0.471)	(0.533)	(0.567)	(0.381)	(0.534)
	传播学	心理学	政府及政治学	心理学	传播学
	(0.333)	(0.388)	(0.272)	(0.356)	(0.452)

* 使用核心—边缘分析的相关性算法计算,取排名前三的学科。

国际舆论研究合作研究网络拥有极高的联通度(0.909)、极低的碎片度(0.091),这表明绝大多数的学科都参与到跨学科合作研究中:社会学处在合作网络核心位置(0.593),政府及政治学(0.471)和传播学(0.333)次之。2001—2020年间,跨学科合作研究活跃程度先升后降,合作网络的边数和平均度分别从2001—2005年的68、3.091下降至2016—2020年的62、2.818;跨学科信息流动变弱,学科之间相互关联度变低,网络密度由2001—2005年的0.147下降至2016—2020年的0.134;跨学科合作参与度变低,网络的联通度从2001—2005年的0.455下降至2016—2020年的0.338,网络碎片度从2001—2015年的0.545上升至2016—2020年的0.662;学科之间的接近程度相对平稳;跨学科合作的核心学科从2001—2005年的社会学(0.534)、经济学(0.533)、心理学(0.388)转变为2016—2020年的政府及政治学(0.625)、社会学(0.534)和传播学(0.452),核心位置更加凸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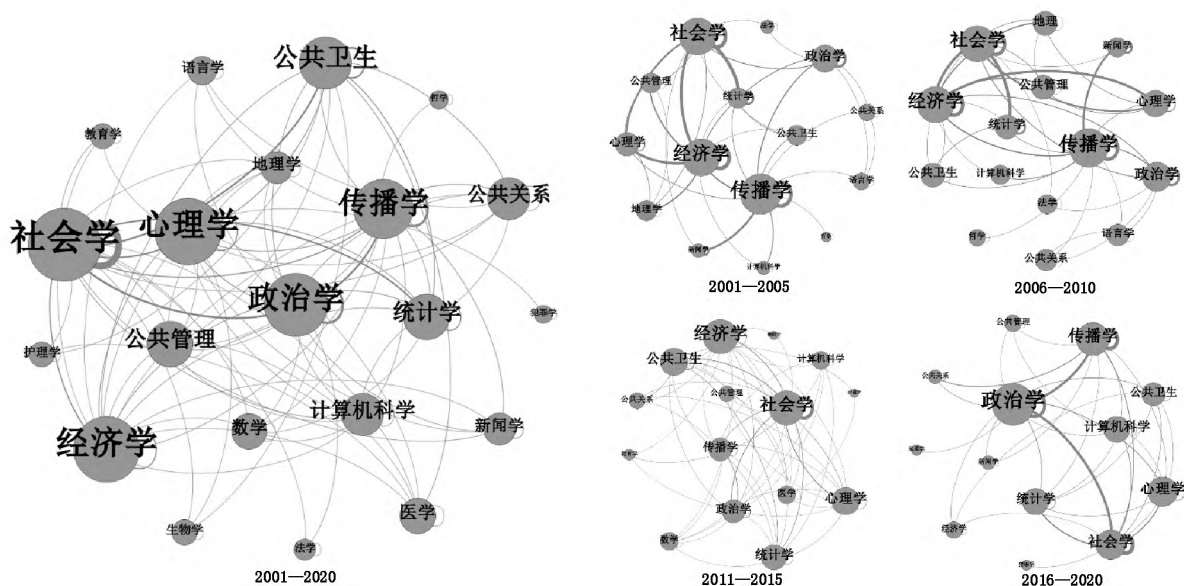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舆论研究跨学科合作研究网络

(四) 为什么研究舆论

明确使用理论的论文占比57.2%,未明确使用理论的论文占比42.8%。2001—2020年间,明确使用理论的论文占比呈波动上升的趋势,从2001—2005年的57.7%增长至2016—2020年的64.9%。而且,舆论研究理论使用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 = 14.436$, $p = 0.002$)。

国际舆论研究的理论主要来自传播学(占比32.0%)、心理学(占比24.2%)、社会学(占比21.6%)、政府和政治学(占比13.6%),来自其余学科的理论占比均不足10%。然而,舆论研究理论来源时期变化的差异,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 = 28.104$, $p = 0.286$)。

深层使用理论的论文占比75.5%,浅层使用理论的论文占比24.5%。2001—2020年间,浅层使用理论的占比逐年下降。而且,舆论研究理论使用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 = 22.552$, $p < 0.001$)。深层使用理论的论文中,主要集中在作为研究框架、理论检验、理论改进和理论整合,占比分别为27.1%、21.4%、11.7%、11%。浅层使用理论的论文中,17.5%的论文为理论应用,6.9%的论文为仅引用。2001—2020年间,作为研究框架、理论改进和理论整合的占比逐年增加;理论应用和仅引用的占比逐年下降。而且,舆论研究理论使用层次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chi^2 = 48.734$, $p = 0.001$)。

在明确使用理论的论文中,总计462次提及了220个理论,其中,161个理论(占比70%)仅被提及1次。如表3所示,使用最多的20个理论(占比9.1%),频次在4至22之间,累计频次占总频次的43.5%。被使用最多的理论为“框架理论”(22次),共7个理论使用频次超过10次。使用频次排名靠

前的理论多为传播学理论。

表3 国际舆论研究 2001—2020 年理论偏好情况(n = 807; 前 20)

序号	理论名称	频次	序号	理论名称	频次
1	框架理论	22	8	铺垫效果	9
2	议程设置理论	20	12	群体效应	8
3	沉默的螺旋	19	12	社会赞许偏差	8
4	动机推理	15	14	满意理论	7
5	社会认同理论	12	15	涵化理论	6
6	选择性曝光	12	15	认知失调理论	6
7	社会期望理论	11	17	杠杆显著性理论	5
8	党派偏见	9	17	政党认同	5
8	第三人效果理论	9	17	接触假设	5
8	敌意媒体效应	9	18	溢出效应	4

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最高为 1310,最低为 0,平均值为 31.96,标准差为 76.87。被引用次数排名前 20 位的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为 396.35 次。13 篇与调查方法相关,包括调查无响应率、无响应偏差和调查技术应用;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实质性研究主要关注受众群体极化问题;仅有 1 篇发表于 2015 年后,其余均发表于更早的年份。

表4 国际舆论研究 2001—2020 年间引文数量情况(n = 807; 前 20)

作者	标题	年份	被引
Groves	家庭调查中的无响应率和无响应偏差	2006	1310
Groves 等	荟萃分析: 无响应率对无响应偏差的影响	2008	637
Iyengar 等	从社会认同的角度看两极分化	2012	623
Keeter 等	衡量无响应对随机数字拨号调查的影响	2006	605
Chang 等	对比全国调查中使用随机数字拨号调查与互联网调查	2009	546
Kreuter 等	电脑辅助、交互式语音和网络调查中的社会期望偏差	2008	493
Herek	公众对男女同性恋者看法的性别差距	2002	392
Flaxman 等	过滤气泡、回声室和在线新闻消费	2016	346
Yeager 等	样本对随机数字拨号调查和互联网调查准确性的影响	2011	344
Groves 等	对主题的兴趣在调查参与决策中的作用	2004	328
Gilens	不平等和民主反应能力	2005	316
Couper 等	网络调查的设计和管理	2001	307
Jennings 等	互联网使用和公民参与: 纵向分析	2003	246
Krosnick 等	未见地的回答对数据质量的影响	2002	237
Bernstein 等	重复上报的投票为何发生,为何需要重视	2001	224
Holbrook 等	选民投票率报告中的社会期望偏差	2010	207
Fricker 等	网络和电话调查的实验性比较	2005	201
Tourangeau 等	调查问题视觉特征的诠释启发法	2004	194
Belli 等	访问方法比较: 历史事件日历和问题列表法	2001	189
Haider - Markel 等	关于同性恋起源的观念与对同性恋权利的支持	2008	182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四个维度,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了 2001—2020 年间《舆论季刊》和《国际舆论研究》刊发的舆论研究论文,对近 20 年国际学界的舆论研究进行评价,为当前新媒介环境下的舆论研究提供实证资料和理论思考。

(一) 谁在研究舆论: 参与地区扩大、高校学者聚集、学科背景集中

国际舆论研究的作者属地集中在北美洲,与先前研究结果一致。然而,本研究还发现,欧洲研究力量的不断增强和非洲学者的出现,促进了国际舆论研究朝研究者属地均衡化的方向发展。欧洲社会调查中心的建立、欧洲晴雨表项目的启动,为欧洲舆论研究提供了完备的数据基础^[24]。同时,《国际舆论研究》为除北美洲之外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由此可见,学术共同体的有序组织,权威、丰富的调查数据的有力保障,学术成果发表平台的拓展,共同推进了国际舆论研究的国际化发展。

目前,舆论研究中,来自高等院校的研究者占大部分,来自企业的研究者占比略高于科研机构的研究者。高等院校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他们的“垄断性”地位不断加强。这说明舆论研究已经成为高等院校一个成熟的研究方向。然而,研究者所属机构越发集中,缺乏不同从业背景研究者的声音,也可能限制舆论研究新观点、新思路的提出。

国际舆论研究者所属学科亦趋向集中,主导学科除政府和政治学之外,还有社会学和传播学。本研究观察到,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不同^[25],心理学研究者未主导国际舆论研究;相反,心理学者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参与度下降,但是,心理学理论的主导性仍然强劲。目前,国际舆论研究构筑了以政府和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为核心的研究队伍,研究领域日趋稳定。

本研究发现,从整体上来看,近20年亚洲作者的占比平稳;但是,来自亚洲的第一作者占比明显增长,2016—2020年占比超过一成,亚洲研究者正积极参与国际舆论研究,推动舆论研究国际化。作为第一作者的传播学研究者的占比超越社会学研究者并持续增长,传播学研究者是舆论研究的主要力量之一。面向未来,国际舆论研究仍需不断壮大研究队伍,加强跨地域的交流合作,拓宽研究视野。

(二)研究了舆论什么:关注选举政治与舆论调查方法研究议题、实质性研究与方法论研究交替主导、实质性研究以舆论效果为主、方法论研究着重延续调查方法研究

国际舆论研究坚持探讨政治与选举、舆论调查方法的传统研究议题,两者占比共计超过七成,这与20世纪末期情况相近。同时,舆论研究关注重要社会议题的舆论问题,包括性别与种族问题、战争与移民问题、经济与科技问题,理论研究、方法研究与社会问题舆论研究紧密结合。

选举与政治作为舆论研究的传统议题,仍然主要关注选举预测、选民态度与选民行为的分析,以及舆论与政府行动、国家政策制定的关系等^[26]。本研究发现,“政治极化”成为近20年选举与政治议题研究的关键词之一。20世纪90年代开始,极化现象备受重视^[27]。党派极化、选民极化、精英极化等研究涵盖了对极化的程度、形成及政治影响的讨论。性别问题主要关注同性婚姻支持、性别差异等问题,欧洲移民和移民态度是移民问题讨论的主要对象。2016—2020年,对重要社会问题的舆论问题的研究占比超过了对研究方法的讨论;但国际舆论研究没有特别偏好某类问题,不同问题研究占比的变化多与某个时期内某类问题的重要影响相关。例如,战争问题的舆论研究,伊拉克战争期间的研究占比(6.4%)达到峰值,之后10年呈现下降趋势。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21世纪前10年,互联网的普及发展推进了舆论调查方法领域的革新。2006—2015年,调查工具对研究数据质量的影响获得广泛关注,舆论调查方法研究大量涌现,例如,电话调查的随机数字拨号方法(RDD, Random digit dialing)与互联网调查的比较研究等^[28]。

20年间的国际舆论研究,实质性研究和方法论研究交替主导,近5年以实质性研究为主导。有效平衡实质性研究与方法论研究,才能推动舆论研究的全面发展。

在实质性研究领域,本研究有如下发现:(1)效果研究是实质性研究的重点,而且,对认知、态度、行为三者的考察具有明显的偏重,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国际舆论研究延续了21世纪初期对态度研究的偏好^[13],主要考察政策、宗教、性别等社会问题的舆论与人们态度之间的关系,以了解人们如何对待舆论,并阐明舆论是如何通过影响个人的态度和行为而被维持、传播和改变的。本研究显示,认知研究在2016年开始增多,同时对心理学理论的使用呈现增长趋势。由此可以预测,舆论效果研究将更多转向认知层面的研究。(2)实质性研究还从多个维度考察了舆论主体特征如何作用于舆论,其中价值观研究略显优势,因为在确定公众是否对特定主题形成个人意见方面,价值观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舆论主体研究同样偏好心理方式学理论,用以分析政治分歧的形成、政治表达的差异等问题。(3)舆论渠道研究方面,21世纪的舆论研究更多综合考察多种媒体。近年来,媒介技术的发展颠覆了公众的传统媒介使用,公众转向“跨媒介”“多模态”的媒介使用模式^[29]。由此,舆论研究从对单一媒体的关注,转向对多样化媒体的综合关注。(4)在内容研究中,呈现出“新闻与评论”主导性强、多样性弱的研究态势。舆论内容研究既有作为传播内容的描述性研究,研究内容框架、意识形态偏向;也有与效果研究紧密联系,研究内容对个人态度、意见表达、政治参与的影响。(5)在实质性研究中,受众研究并未受到重视。2016年以后,政治人物是否关注舆论,以及舆论是否影响他们的判断和行为等问题,成为舆论受众研究

的热点。

调查是倾听公众声音的关键工具。21 世纪的舆论方法论研究,仍以调查法为核心方向。虽然现在的调查技术手段十分丰富,但是调查响应率大幅下降,这增加了舆论研究的难度和成本,成为舆论研究最大的困扰^[30]。近 20 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混合调查方式(mixed-mode surveys),采用不同调查工具与方法进行抽样调查获取数据^[7]。混合调查方法可以降低无响应偏差,并避免因不完整的抽样框所导致的覆盖误差。但是,如何解决混合调查方法引入的选择效应等其他测量偏误,是目前调查研究方法需要不断完善的方向。新的数据收集方式促使研究者投入到样本及抽样设计的研究中,问卷设计研究的占比则可能进一步下降。

(三) 如何研究舆论: 实证研究为主流、依赖调查研究、数据来源不断扩展、受资助水平有所提升、跨学科合作研究数量增长,应拓展新学科组合

国际舆论研究取向延续了 20 世纪末期以实证研究为主的趋势。近年来,国际舆论研究几乎全部为实证研究,研究者善于通过假设检验和建模预测来理解舆论问题。为了了解公众对舆论做出了何种反应,以及他们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反应,未来研究应如《舆论季刊》所号召和鼓励的,进一步分析定性材料,采用多样方法^[3]。

绝大多数国际舆论研究明确使用研究方法,但似乎还未能摆脱依赖调查数据分析报告舆论的状况,方法创新有待加强。一方面,近 20 年国际舆论研究热衷于使用传统调查法,占比仍在增长;虽然新的舆论测量方法需要实验结果的支持^[31],而且实验法有助于推断舆论问题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实验法的占比涨势缓慢。另一方面,伴随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虽然研究者可以大规模实时捕捉在线互动和表达,但新的数据收集方法面临着道德和法律层面的挑战、对公众隐私的考量、对数据代表性的要求,这些也使得国际舆论研究对新方法保持谨慎。目前,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在线实验研究应用愈发广泛,以期能够平衡上述问题,完善方法储备,提高研究质量。

近 20 年来,国际舆论研究正在摆脱北美一家独大的局面,来自欧洲、亚洲的数据逐年上涨,跨洲数据占比有所增加。但是,无论是从单一国家的研究频率,还是从跨国研究的参与程度来看,国际舆论研究对核心地区的覆盖依旧比边缘地区密集得多^[16],舆论研究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尚未得到改善。

2001—2020 年间国际舆论研究受到资助的占比持续增加,尤其是政府资助,占比增长达一倍多,世界各国政府对舆论研究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在不断推进跨国研究的背景下,实证调查研究需要充足的经费保障。无论是资金资助还是提供数据共享,专业化程度高、数据质量要求高、注重理论研究的国际舆论研究,对资助的需求将不断加大。

国际舆论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数量快速增长,参与学科广泛,但新学科组合鲜见。近 20 年间,国际舆论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占比增长近一倍,共有 16 个学科参与。本研究显示,更频繁次的合作、更加紧密的连接,使得合作研究表现活跃且处于核心位置的社会学、政府和政治学、传播学成为助力舆论研究发展的 3 个主力学科。同时,在方法论研究备受重视的时期(如 2006—2015 年),心理学、经济学、公共卫生学等学科一度成为跨学科合作研究网络的核心。舆论研究借鉴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框架,发挥公共卫生学等学科的数量统计方法优势,提高研究质量。国际舆论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更应注重新的学科组合,如计算机科学、数学等学科与传播学、政治学的合作,以应对大数据、移动化、智能化等新传播技术不断发展背景下的舆论新样态,为理论建构、方法创新服务,为舆论研究注入新的动力。

(四) 为什么研究舆论: 理论构建逐渐增强、理论创新有待加强

国际舆论研究的理论构建水平逐渐增强,形成了以心理学和传播学为主导的理论基础,但是,理论创新水平有待加强,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明确使用理论的研究不断增加,然而,大部分理论仅被使用一次,使用次数最多的是框架理论,仅为 22 次。由此可见,国际舆论研究的理论使用,呈现使用的理论多元化、主导性理论不明显的特征。第二,主要运用心理学和传播学理论开展舆论研究。传播学提供了国际舆论研究的核心理论。在国际舆论研究使用数量前 20 位的理论中,经典传播学理论占据近一半。同时,本研究推论,随着认知层面的舆论效果研究不断推进、舆论主体研究持续增长以及方法论研究的发展,心理学理论对舆论研究的影响将更加强烈。目前,动机推理、社会认同等心理学理论

已是舆论研究最常使用的理论,认知心理学理论也被广泛用于调查响应动机研究^[11]。第三,理论使用不断深入,理论改进、理论整合研究的占比不断增加。国际舆论研究正在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寻求舆论问题的答案;并且,理论主要被以“重新定义、组织和扩展”的形式,确定解释舆论问题的相关变量。但是,近20年国际舆论研究的理论创新较少,需要研究者展开多层面的舆论研究,积累对已有理论的批评、改进、整合等研究,提升理论创新水平。

在国际舆论研究位居前20位的高被引论文中,并未发现大量研究与政治议题相关。大部分论文发表于2001—2010年间,虽然更早发表的论文更可能获得更高的被引用数量,但是主要由于这个阶段媒介技术发展对舆论研究方向产生了较大影响,研究者希望将新技术运用于舆论研究,对调查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相关成果大量被引用。最近的高被引论文是2016年发表的《过滤气泡、回声室和在线新闻消费》^[32],作者通过页面插件追踪5万人的网页浏览数据,对在线新闻加剧了回声室效应还是促进了观点多元化这一热点问题探究,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为选择性曝光、群体极化、党派偏见等研究,提供了理论使用和研究方法的指导。由此可见,突破研究方法瓶颈、深入探究新舆论环境中的理论问题,是国际舆论研究论文获得高被引用的关键因素。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2001—2020年间《舆论季刊》和《国际舆论研究》所刊舆论研究论文的分析,为舆论研究提供未来的研究议程。首先,舆论研究的实质性研究需要平衡各项研究议题,拓展舆论内容、舆论渠道等研究。新媒体背景下,公众媒介使用形态已然发生变革,多种媒介样态及其舆论内容生产不断变换,媒介迅速发展,为人际传播带来更强大的影响力^[33],线上与线下渠道的融合让舆论传播过程更加复杂。第二,新理论的提出、验证和改进是理论建设的核心部分,虽然国际舆论研究已具有较高的理论使用水平,但是在创新性方面仍然缺失,舆论研究要加强理论批评、理论改进,以此推进舆论研究的理论建设。第三,舆论研究应该多尝试新的学科合作,包括计算机科学、数学等学科,以此拓展更加丰富的研究方法,以回应大数据智能时代的舆论问题。第四,舆论研究应该囊括更加广泛的数据来源,增加样本的多样性,包括亚洲、非洲、南美洲的跨国数据,为舆论研究结果提供更加广泛的证据。最后,就中国舆论研究而言,要超越“地方性”壁垒,寻求更高层次的对话^[34],需要多开展量化研究,注重理论的深层使用,加强国际舆论传统议题的研究,例如关注调查研究方法等研究议题,提升中国舆论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本研究存在以下几点局限:首先,本研究没有覆盖专著、其他期刊等出版物上的舆论研究论文;其次,尽管本研究对国际舆论研究的4个维度10个研究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由于数据的局限,有些变量没有被纳入,例如抽样方式、期刊编辑信息等;最后,对于国际舆论研究的趋势分析,本研究以5年为分析单位,而一些关键的会议或社会运动等时间节点也会对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增加新的研究变量,更系统地揭示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 [1] Converse P 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J].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87(51) : 12 - 24.
- [2] Mutz D C, Young 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Plus ça change? [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11(5) : 1018 - 1044.
- [3] Edgerly S, Thorson K.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Innovative research for the digital age [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20(51) : 189 - 194.
- [4] 廖圣清. 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新进展: 以对1990年代五本大众传播国际核心期刊的内容分析为主要依据 [J]. 新闻大学, 2008(4) : 67 - 76.
- [5] Kuhn, Thomas S. The halt and the blind: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science [J].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80(2) : 181 - 192.
- [6] Burstein P.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public policy: A review and an agenda [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3(1) : 29 - 40.

- [7] Groves R M. Three eras of survey research[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11(5) : 861 – 871.
- [8] Fisher B R. Public Opinion as a Process in Society[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50(6) : 1 – 14.
- [9] Silva A E F A ,Prado J W ,Alcântara V C ,et al. Public opinion: Bibliometric analysis for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rends[J]. Ho-los 2018(4) : 2 – 30.
- [10] Walter N ,Cody M J ,Ball – Rokeach S J. The ebb and flow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even decades of publication trends and research priorities[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8(2) : 424 – 440.
- [11] Miller P V.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02 – 2008: The Disciplines ,Technology and the Publishing Business[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11(5) : 854 – 860.
- [12] Presser S. Substance and Method i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37 – 2010 [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11(5) : 839 – 845.
- [13] Speier H.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0(4) : 376 – 388.
- [14] Price V. Public opinion[M]. London: Sage ,1992: 45 – 67.
- [15] Lasswell H D.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J].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1948(1) : 136 – 139.
- [16] Craig A Hill ,Cynthia R Bland. Government Relations [C]//. A Meeting Place and More···: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Washington ,DC: AAPOR 2020: 189 – 200.
- [17] Weaver D H ,Gray R G.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Past ,Present & Future[J].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1980(1) : 124 – 151.
- [18] Price V.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 the new century: Reflections of a former POQ editor[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11 (5) : 846 – 853.
- [19] Grootendorst M. BERTopic: Neural topic modeling with a class – based TF – IDF procedure [J]. arXiv preprint arXiv: 2203. 05794 2022: 1 – 3.
- [20] Newman M. Network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1] Borgatti S P ,Everett M G ,Freeman L C. Ucinet for Windows: Software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J]. Harvard ,MA: analytic technologies 2002(6) : 12 – 15.
- [22] Bryant J ,Miron ,D.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4(4) : 662 – 704.
- [23] 廖圣清 ,朱天泽 ,易红发 ,等.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谱系: 议题、方法与理论(1998—2017) [J]. 新闻大学 2019 (11) : 73 – 95.
- [24] Eichenberg R C. Trends: Having it both ways: European defense integration and the commitment to NATO [J].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03(4) : 627 – 659.
- [25] Korzi M J. Lapsed memory? The roots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J]. Polity 2000(1) : 49 – 75.
- [26] Hillygus D S. The evolution of election pol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11(5) : 962 – 981.
- [27] Fiorina M P ,Abrams S J.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J]. Annu. Rev. Polit. Sci. 2008(11) : 563 – 588.
- [28] Chang L ,Krosnick J A. National surveys via RD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versus the Internet: Comparing sampl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response quality [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09(4) : 641 – 678.
- [29] Feldman S. Structure and consistency in public opinion: The role of core beliefs and valu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8(2) : 416 – 440.
- [30] R Baker. Technology [C]. A Meeting Place and More···: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Washington ,DC: AAPOR 2020: 117 – 144.
- [31] Weeks B E ,Ardèvol – Abreu A ,Gil de Zúñiga H. Online influence? Social media use ,opinion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per-suas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17(2) : 214 – 239.
- [32] Flaxman S ,Goel S ,Rao J M. Filter bubbles ,echo chambers and online news consumption [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16 (S1) : 298 – 320.
- [33] Walther JB ,Gay G and Hancock JT (2005) How do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researchers study the Internet?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5(3) : 632 – 657.
- [34] 张涛甫 ,徐亦舒. 寻求对话: 在舆论研究的特殊性与普适性之间 [J]. 新闻大学 2017(5) : 23 – 28.

(责任编辑: 戴利朝)